



国学经典读本丛书

近思录

〔宋〕朱熹
吕祖谦
王广注

山东齐鲁出版社



国学经典读本丛书

近思录

〔宋〕朱 熹 吕祖谦 撰

王 广 注

山东齐鲁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思录 / (宋) 朱熹, (宋) 吕祖谦撰; 王广注.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4.2
(国学经典读本丛书)
ISBN 978-7-5474-1058-5

I. ①近… II. ①朱… ②吕… ③王… III. ①理学
— 中国—南宋 ②《近思录》—注释 IV. ①B244.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37712号

丛书策划 尹奎友

责任编辑 怀志霄

装帧设计 王 芳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479 82098476 (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

规 格 140毫米×203毫米

10.125印张 160千字

版 次 2014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出版说明

国学原指国家设立的学府，如小学、太学、国子监等。《周礼·春官·乐师》：“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孙诒让《周礼正义》：“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由此可知，在周代，国学是国家所办的一种贵族子弟学校。到了汉代，在京师设太学，为中央最高学府。隋代以后的历朝历代都设国子监，而国子监内同时也设太学。

国学作为学问一说，始于20世纪初期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背景下。1902年秋，梁启超写信给黄遵宪提议创办《国学报》，“以保国粹为主义”，使用了“国学”一词。1906年9月，章太炎在东京发起国学讲习会，不久之后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国学振起社。到“五四”爱国运动前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设立了国学门，出版《国学季刊》；清华大学成立了国学研究院，编印《国学论丛》；章太炎在上海等地演讲国学，出版了《国学概论》，国学研究之风大盛。至此，“国学”一词完成了由“国家设立的学府”向“我国固有的文化学术”意义的转变。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学再度复兴，国学热一浪高过

一浪。民间出现了以传授国学为主的私塾和国学馆，有的中小学校开设了国学课，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诸多大学相继创办了国学研究机构。这些举措，既带动了系统而精深的专业化国学研究，也带动了面向社会大众的常识性国学教育。

国学作为我国固有的文化学术，其主要内容是什么呢？1906年，章太炎在日本主编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刊登《国学振起社广告》，圈定国学讲授内容为：“一、诸子学；二、文史学；三、制度学；四、内典学；五、宋明理学；六、中国历史。”（按“内典”即佛典）按照传统的分类，国学包括经、史、子、集四部，以经部、子部为重，尤倾向于经部。现在我们通常所说的国学，是指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涵盖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并历代史学等在内的一套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

要学习国学、研究国学，首先要做的是回归国学经典文本的阅读。近代以来，胡适、梁启超、顾颉刚、鲁迅、汪辟疆、朱自清、钱穆等著名学者都曾为国人开列过国学必读书目。20世纪90年代，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学者、教授们也为学生开列过应读书目。我们此次策划出版“国学经典读本丛书”，就充分参考了以上大家、学者的意见，推出了《周易》《诗经》《大学·中庸》《左传》《论语》《孟子》《国语》《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老子》《庄子》《韩非子》《列子》《荀子》《孙子兵法·孙臆兵法》

《世说新语》《颜氏家训》《金刚经·心经》《坛经》《百喻经》《近思录》《传习录》《楚辞》《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元曲三百首》等三十种，呈现给广大读者。本丛书充分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对所选国学经典进行注释、翻译，对难字加以注音，有的还在篇前加以导读性质的题解。其中，古文辞类各书采用原文加注释和译文的形式，诗词类各书采用原文加注释、赏析和辑评的形式；对于大部头的原著采用选编的方式，选择其重要且可读性强的篇章。丛书追求注释简明，译文通达。本丛书的编辑出版，旨在为国学爱好者提供一套浅近晓畅的国学读本——通过难字注音，使读者诵读经典顺畅无碍；通过题解、注释、翻译和赏析，令读者领悟国学经典的内在魅力，彰显国学经典的现代价值。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2年3月

前言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列举中国人了解国学的必读书目时，仅仅列出了七部书，其中便有《近思录》。这部著作本是朱熹与吕祖谦有感于北宋理学著作令初学者无法把握，所编著的一部理学入门书。

乾道五年（1169）九月，朱熹七十岁的老母祝氏亡故，第二年正月，葬于建阳县崇泰里后山天湖之阳的寒泉坞。朱熹为守墓住在云谷山，这期间他在墓旁建起了一座寒泉精舍，以接纳来学士子。寒泉时期，是朱熹学术生涯中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从乾道六年（1170）至淳熙元年（1174），朱熹先后八次辞免朝命，潜心研究，著书立说。

为了更好应对佛老在形上思辨方面的优势，朱熹首先诠释了周敦颐、张载的《太极图说》和《西铭》篇。乾道六年，他完成了《太极图说解》和《西铭解》两部著作。在这两部著作中，朱熹把汉唐儒者以天人感应的目的论、阴阳五行的气化论为基调的宇宙图景，转化为以一个以形上之理作为生化根据、阴阳五行之气作为生化材质的宇宙图景。

除了弥补汉唐儒学形上思辨的不足，朱熹还借同湖湘学

者的论战，来建构为汉唐儒学所轻忽的心性学说。这次论战从乾道六年一直持续到淳熙元年，历时四年多。在这次论战中，朱熹和以张栻为代表湘湖学者先后讨论了性学、仁学和心学方面的思想，这些思想体现在《论性答稿》《仁说》和《观心说》三篇著名论文中，这三篇论文标志着朱熹的性学、仁学和心学思想的建立。

通过吸取周敦颐、张载、二程的思想，参照佛老文化，朱熹为儒学建立起一个有着形上本体论、心性工夫论之话语体系的“生命的学问”。钱穆先生指出，当时理学中人，知有程颢、程颐，但不知有周敦颐、张载，以二程之说为是，以周、张之说为非，朱熹对周、张的表彰是当时理学的“一大转手”，标志着寒泉时期的朱熹已从归宗二程学到超越二程学，实现了对周、张、二程四子之学的融会，直接催生了朱熹以四书学为核心的经学体系建设。

在朱熹看来，四子学是解读《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这个有机一体的四书学的阶梯。这一时期，他建构了一个以四书《集解》为核心的四书学体系。朱熹在乾道六年曾修定《中庸集解》，又名《中庸详说》；乾道七年《大学章句》初稿写成；乾道八年正月，把修订的《孟子集解》和《论语要义》合并为一，取名为《论孟精义》，这年秋又写出《中庸章句》初稿。进一步讲，四书学也是解读五经的阶梯。这一时期，朱熹的经学建设主要体现在乾道九年所修订的《诗集解》上。不过，这一时期朱熹的四书学和后来的以四书《集注》为核心的四书学体系相比较，还不够成熟。在这

些基础上确立的五经学体系自然也很不成熟，在经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许多经学观点还没确立。

为进一步传播自己所确认的以四子思想为正统的理学文化，帮助那些“不知所入”的后学会理理学文化的独特话语体系，就需要编写一本能够集中体现四子思想的著作，来传播自己确立的学术文化主流意识。淳熙二年（1175）夏季，四十六岁的朱熹在寒泉精舍迎接到了一位重要客人。这位客人就是将要和他一起编纂《近思录》的吕祖谦。吕祖谦（1137—1181）出身名门望族，虽然在经学、史学上与朱熹存在分歧，但是在理学上也信奉二程，加上他兼取包容、折中百家的态度，因而能够求同存异，与朱熹共同编订《近思录》。

这一时期的朱熹与吕祖谦，都面临着如何对待江西心学派和两浙事功学派的问题，尤其是前者。对朱熹来说，建立自己的学派就需要同其他学派竞争，一方面明晰阐述二程的理学体系已经成为必要，这就需要有一本能够概括二程理学体系的著作作为学习二程理学的简便阶梯，以吸引士子“入吾彀中”；另一方面还需要各学派的领袖坦率地到一起来相谈面论，交流思想。在朱熹这种想法之外，吕祖谦更有一重折中众家、会归众说于一的打算。而这一切又必须以朱熹和吕祖谦两位理学大师统一思想、认识一致为前提。寒泉之会让两人的认识大致统一起来，《近思录》就是他俩思想交流的成果。

吕祖谦从东阳来到建阳，住在朱熹的寒泉精舍。二人自

四月初到五月初，朝夕研读、讨论四子著作和思想，历时一个月左右，完成了《近思录》的初编。《近思录》初稿的完成是在朱、陆鹅湖之辩的前夕。朱熹与吕祖谦选编《近思录》之后，便携朋友、门人自闽北赴江西信州鹅湖寺，与二陆会面论学。可见，《近思录》的编订标志着朱、吕二人已确立了他们学术思想的全部宗旨与细节，《近思录》为他们准备了面对二陆挑战的话语体系。甚至可以说，在某一程度上，《近思录》的编辑正是为了与二陆论学而明确理学形上本体理论和基本心性工夫的活动。

当然，寒泉著述时期的《近思录》只是初稿，从初稿到定稿成书历时约三四年，很可能在淳熙五年才最终定稿，因为淳熙五年之后朱熹给吕氏的信中再没有谈及《近思录》改订的事宜。从公私藏目著录看，《近思录》定稿之前的本子不止一种。朱熹在世时，《近思录》传本互有差异，《四库全书总目》就指出：“《近思录》虽成于淳熙二年，其后又数经删补，故传本颇有异同。”

自从南宋淳熙二年编定以后，《近思录》在理学发展史上已经成为宋、元、明、清理学的经典。作为解读理学典籍和体系的典范，《近思录》历代传本都有注家诠释，屈指数来，也有十数家之多。诸家当中，能各见其长而为学者接受的，有宋代叶采注本和清代茅星来、江永、张伯行三家集注本。

叶采本最早出，自称为注此书“逾三十年”，“其诸纲要，悉本朱子旧注”。叶采本成于宋淳祐间（1241—1252），

大行于元、明两代。这种至尊地位后来虽然不再，却仍不失其独特的价值，因为其毕竟是最接近和亲近朱熹的人的注本。

清康熙间（1662—1722），茅星来注《近思录》，该注以考据见长。在版本上，选取了周、张、二程理学四子全书，以及宋、元以来《近思录》的不同版本作为参照；在校勘上，“其先后次第，悉仍其旧，旧本舛错，仿朱氏《论》《孟》重出错简之例，注明其下，不敢擅自更易”；在注释上，能够荟萃众说，对于名物训诂和考证尤详，“又仿朱氏《论》《孟》附《史记》世家、列传例，取《伊洛渊源录》中四先生事状，删其繁复，为之注释，以附简端”。如此等等，其得在详繁，其失在不能精简。

康熙朝儒学名臣张伯行的注，凸显了义理阐述，十分本色，可借此窥探清代宋学中人的思想理路。张伯行本《四库全书》未收，被辑入《丛书集成初编》，通常可见。相比较之下，江永集解本比茅、张二本有更多优胜处。

江永集解本的一大优势是用朱熹之言解《近思录》。《近思录》问世后，朱熹有很多议论、评说文字散见在各书中，那是理解《近思录》最好的注脚。江永把“凡朱子《文集》《或问》《语类》中其言有相发明者，悉行采入分注”，方便读者参用。尤难能可贵的是，他剪取诸家注释要而不繁，博采众长，亦间附己意，且详略得当，极宜入门初进。故其书一出，即成为最通行的注本，及至今日，尚无出其右者。

《近思录》选编的是北宋理学的文献，但对今人来说，

以此书入门并不容易。即使其中语录的部分带有当时口语的特色，对今天的人也已不易读。其不易读，不仅是古文与现代白话语文的差异，事实上《近思录》的古文本身并不是很难读的，真正的困难在于《近思录》的内容是一套从儒家经典化出的话语体系。本注解在参照叶采等以往注释及时贤注释成果的基础上，除了词义简释外，更重视理学“话语体系”所形成的经典出处的注解，以此管窥：《近思录》何以成为解读理学四子思想之阶梯；理学四子思想又何以成为解读以四书学为核心的经学体系之阶梯的脉络。

目 录

卷一	道体	1
卷二	为学	28
卷三	致知	71
卷四	存养	105
卷五	克治	134
卷六	家道	153
卷七	出处	165
卷八	治体	185
卷九	治法	201
卷十	政事	220
卷十一	教学	247
卷十二	警戒	258
卷十三	异端	271
卷十四	圣贤	282
后序		
	朱熹《书近思录后》	297
	吕祖谦《近思录跋》	298
附录：《近思录》与理学话语的建构		300

卷一 道体

【题解】

本卷旨在论述天道变化的形上本体与人性至善的形上本原，也就是理学家常说的阴阳性命之理。叶采的题解为：“此卷论性之本源，道之体统，盖学问之纲领也。”共收录五十一条，其中周敦颐两条、张载九条、二程合四十条。该卷不仅是全书的大纲，也是理学思想的总纲领。

理学主要奠基者程颐指出：“能文者谓之文士，谈经者泥为讲师，惟知道者乃儒学也。”（《二程遗书》卷六）在理学家看来，自孟子以后的儒林，充斥着“能文者”和“谈经者”，而鲜于“知道者”。与佛老，尤其是佛教文化相比，汉唐儒学缺失了两个识度：一个是“形容道体”，另一个是“心上起工夫”。也正是由于这个“形容道体”识度的缺失，导致汉唐儒者虽然一直在说天道变化，但始终无法说到宇宙的形上本根（体）层面；虽然一直在论人性至善，但始终无法说到人之生命的形上本原（真）层面。

该卷第一条的《太极图说》就是“形容道体”的佳作，周敦颐也因该文被朱熹推尊为理学的开山祖师。这个短篇言简意赅地阐明了宇宙的本体及发用：无极而太极，一动一静而生阴阳五行；论述了人之生命的本真及流行：人得二气五行之秀而最灵，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此外，最著名的命题还有程颐的“性即理也”（第三十八条）与张载

的“心统性情者也”（第五十条）。前者指出天地万物的本性无不禀自上天所赋予的天理；后者指出心统摄性与情，性为心之体，乃喜怒哀乐未发的“寂然不动”，情为心之用，乃喜怒哀乐已发的“感而遂通”。这两者让儒学拥有了可以同佛老文化抗衡的心性论，不仅让人性论有了形上本原层面，而且还有了“心上起工夫”的识度。

鉴于该卷所揭示课题的重要性，所以被列为全书之首。吕祖谦在《近思录跋》（见《后序》）中解释说，该卷可以让后学“特使知其名义，有所向往而已”，如果不重视该卷所揭示的“道体”，阅读《近思录》就会“茫然不识其梗概”，不知道该著作所讲的为学、致知、家道、政事、讲学等诸方面内容植根的形上基础是什么。当然，朱熹一再叮咛吕祖谦务必告诫后学，要想体会这个“极高明”道体，必须“道中庸”，“循是而进，自卑升高，自近及远”，坚决反对“厌卑近而骛高远，躐等凌节，流于空虚，迄无所依据”。因为这个儒家所讲的“道体”如同该卷第十九条所说“器亦道，道亦器”，虽然“道体”“直造先天未画前”，未有天地之前就已经存在，但其“不离日用常行内”，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就是道体流行的道场，我们见父知孝、见兄知悌的日常行为就是道体的发用。

1.1 濂溪先生^[1]曰：无极而太极^[2]。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3]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4]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

五^[5]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6]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本注：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而主静（本注：无欲故静。），立人极焉。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7]，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8]”又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9]”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周敦颐《太极图说》）

【注释】

〔1〕濂溪先生：即北宋理学家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原名敦实，因避宋英宗旧讳改名敦颐，道州营道（今湖南南道县）人。晚年知南康军时，家居庐山莲花峰下，取故居之“濂溪”名之，世称濂溪先生，卒谥元公。著《太极图说》及《通书》，阐发儒家经典中的心性义理思想，被后世尊为宋明理学之开山祖。〔2〕无极而太极：

“无极”概念源于《老子》：“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太极”语出《周易·系辞传上》：“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都是指宇宙生生不息的本根（体），人和天地万物的本真（原）状态。朱熹把“自无极而太极”中的“自”删去，认为不是太极之外另有一个“无极”，而是以“无极”一词来形容太极这一本根（体）的无声无臭和广大无边的情状。

〔3〕两仪：阴阳。〔4〕五气：五行（金、木、水、火、土）之气。

〔5〕二五：阴阳二气与五行。〔6〕五性：仁、义、礼、智、信。

〔7〕圣人与天地合其德：语出《周易·乾卦·文言传》对“大人”生

命情态的描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8〕“立天之道，曰阴与阳”句：语出《周易·说卦传》：“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9〕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语出《周易·系辞传上》：“《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也。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原，考察。反，反观。

1.2 诚无为^{〔1〕}，几^{〔2〕}善恶。德^{〔3〕}爱曰仁，宜曰义，理曰礼，通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4〕}之谓圣；复焉执焉^{〔5〕}之谓贤；发微不可见、充周^{〔6〕}不可穷之谓神^{〔7〕}。（周敦颐《通书·诚几德第三》）

【注释】

〔1〕诚无为：指人和天地万物的本真状态。诚，真实无妄。无为，自然无伪无欲。〔2〕几：语出《周易·系辞传下》：“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在此指善恶之念将动而尚未外显的征兆，这一征兆体现着“诚无为”的本真状态现世化为人之日常行为善恶的机缘。

〔3〕德：张伯行《近思录集解》卷一：“道得于身谓之德。”是指天道显现在个体身上的德性。〔4〕性焉安焉：圣人的生命本真状态之自然澄明。“性焉”是指本性如此，“安焉”是指安然而行，不待勉强学习。

〔5〕复焉执焉：贤人的生命本真状态之有意去蔽。“复焉”是指返复本性，“执焉”是指操持固守而不失。执，守。〔6〕充周：使诚扩充而周遍。〔7〕神：一种人和天地万物一体合流的神妙莫测情状，语出《周易·系辞传上》：“阴阳不测之谓神。”